

文化革命資料选輯

(二)

(內部讀物)

貴州大学教務处編

D6
9/2

目 录

关于时代精神問題討論專輯之二

略論时代精神問題.....	姚文元 (1)
时代和时代精神.....	田 丁 (18)
时代精神与文学典型.....	陈鳴树 方 胜 孙雪吟 (32)
时代精神和典型問題.....	馬 白 郭志今 (55)
塑造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任务	阮国华 田本相 (67)
时代精神与英雄形象的塑造.....	吳中杰 (79)
要塑造怎样的当代英雄形象.....	张 炯 (88)
略論塑造当代英雄人物形象的几个問題.....	王紹璽 (102)
宣揚資产階級情調才是真实嗎?	刘宏林 赵国青 (115)
描写无产階級的个性还是宣揚資产階級的 “人性”?	刘梦溪 (125)

【附】

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 (136)
統一整体与分別反映.....	周谷城 (148)
史学与美学.....	周谷城 (159)
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問.....	金为民 李云初 (167)
从《归家》评价想到的几个問題.....	金为民 李云初 (173)
关于新人、英雄形象塑造諸問題的质疑	金为民 李云初 (180)

略論时代精神問題

——与周谷城先生商榷

姚 文 元

周谷城先生在《新建設》6月发表了《評〈关于艺术創作的一些問題〉》一文，是答复別人对他文章的批評的。他认为別人的文章，是“不正派”“无的放矢”“任意批評”“怕見原文”“蒼白无力”“裝了許多形而上学思想”“有意歪曲”“白話文的思路不清”……而自己的論断則“明白具体地”“属历史唯物論的范围”。这就引起了人們的一个問題：究竟艺术創作中的历史唯物論是不是如周谷城先生解释那样呢？周谷城先生的观点，究竟是不是真的属于历史唯物論呢？

階級斗争的观点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唯物論的灵魂。“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1頁）究竟周谷城先生坚持的艺术观点是不是“属历史唯物論”？只要分析一下，他的文章是不是用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去观察艺术創作的根本問題，就可以弄清楚了。

周谷城先生共列举了七条反駁来“互相帮助”，这里只想就其中的一条，即关于时代精神問題，提出来进行討論。这是文艺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問題，目前議論也很多。周谷城先生

认为：“我用历史的、阶级的观点阐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所说极为明白具体。”他自己所谓“极为明白具体的观点”，主要也就是表现在对于“时代精神”的解释。下面是他的一段原文（他在《文艺报》上的文章也照抄了这段话，当作“艺术作品反映斗争，又为斗争服务”的具体内容。）：

“超出模仿的东西，就一方面说，虽属于创作；然就另一方面说，却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社会分裂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出现的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此更复杂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更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随着不同；各种斗争亦随时代而有异。封建时代，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不断爆发斗争；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不断爆发斗争。因此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的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

这就是说：

（一）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

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的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

（二）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的整体”，但却又从“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这种不同“进入”艺术作品“即成为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各个阶级各种“具体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三）时代精神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

这三个论点，涉及到什么是时代精神以及文艺作品怎样表现时代精神的问题。

时代精神是各个阶级意识的“汇合”吗？

历来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对于时代精神有形形色色的解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时代精神看成一种超阶级的、脱离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孤立存在的精神现象。例如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把时代精神看成一种抽象的“精神气候”，“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中译本35页）由于脱离阶级斗争，不是从对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的阶级分析出发抓住其本质的内容，而是把一些表面现象（打仗、饥饿、太平……等等）不分主次地罗列起来，把这些现象脱离开它的具体内容而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社会“状态”，由这种抽象的社会状态去决定“时代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的臆断。泰纳用以说明产生不同精神状态的三种类型的时代：“悲伤的时代”产生了“悲观绝望占优势的精神状态”，“快乐为主的时期”产生了“快乐的时期主调”，“中间状态”的时代产生了“快乐与悲哀混杂”的精神状态，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周谷城先生认为阶级社会中时代划分为各个相互对抗的阶级，这是对的。但他仍旧是把各个阶级、各种斗争、各种“复杂”的阶级意识凑在一起地罗列起来。他没有分析：究竟是一个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是推动历史进步并反映历史前进方向的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走向死亡的阶级。他没有区别不同阶级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作用，当然也就没有分析不同阶级的意识在时代生活中的不同作用，反映不同阶级意识的各种文艺创作在反映时代精神上的不同作用。由于把相互对抗的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列起来，就必然得出“汇合”论，“整体”论，得出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以其“特征”反映时代精神的错误观点。

把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解释成各个阶级各种意识的“汇合”，这在理论上是沒有根据的，是违反客观实际的，它同充满各种思想的剧烈斗争的文艺史，同我们社会文艺实践完全矛盾。时代精神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阶级社会中就必然反映一定的阶级内容，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东西。相互敌对的阶级意识，从来也没有共同构成“整体”的时代精神，而总是一种革命思潮代表了时代精神向反动的思潮进行剧烈的斗争。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当着革命人民向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冲击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曾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艺家们写了大量的作品，说了千言万语，但其思想核心也还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反动的封建教会、封建贵族们所鼓吹的神权、皇权和禁欲主义等等，则是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敌对的反动思潮。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反动性就越来越暴露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无产阶级的阶级理想、阶级要求，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则成为同时代精神相敌对的反动思潮。《马赛曲》和《国际歌》，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在文艺上的鲜明表现，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在文艺上的鲜明表现。

当1792年马赛的义勇军高唱着《马赛曲》从马赛开进巴黎去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封建制度的痛恨和为保卫共和制度而牺牲的勇气，《马赛曲》表达了这种时代精神，才能为战斗的群众所接受。可是当资产阶级分子在1896年再唱着《马赛曲》来破坏法国工人在里尔召开的大会时，《马赛曲》中号召保卫资产阶级政权已变成工人们痛恨的反动的制度，唱《马赛曲》扰乱大会就成为同无产阶级鲜明的敌对的行动。工人们一齐唱起《国际歌》来回答《马赛曲》，《国际歌》雄亮的革命声音彻底压倒了陈旧的《马赛曲》。新的时代精神胜利了。怎么能够说，“吾皇万岁”的颂诗同《马赛曲》、《马赛曲》同《国际歌》等思想内容根本对立的作品，都“汇合”而成“当时”同一个时代精神呢？这是难以想象的，是违反逻辑的。

其实，既然承认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阶级对抗，那么，反映各个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也就必然存在对抗，而不可能“汇合”成什么“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当然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而不可能“汇合”成什么“统一的整体”。解放以来文艺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文艺作品强烈地表现时代精神的时候，总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十分高昂的时候，是社会主义文艺同资产阶级、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并进行了坚决斗争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后出现的《创业史》等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大跃进

中的民歌；总路綫提出后产生的一批充滿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精神的作品；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时期出現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年輕的一代》（这是一部在思想性和战斗性应予以充分估价的好作品）等剧作，都是这样。而当着封建思想、資本主义思想侵蝕革命文艺队伍的时候，当着阶级界限模糊的时候，便会出现一批脱离革命时代的頌古非今、借古諷今、歌頌和美化封建奴才哲学和資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言論和作品。能够說这些东西也“汇合”成为当前的时代精神嗎？不能的，因为这些东西是要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到旧时代去，它只能反映留恋、向往旧时代剝削阶级的幽灵的沒落者的精神状态，这当然是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敌对的。

什么是时代精神？

仅仅承认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意識，並不等于历史唯物論，並不等于正确地解释了时代精神的内容。如果像周谷城先生那种把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識統統杂凑成一鍋，即使承认了各个时代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可能把阶级斗争抽象化。要科学地認識什么是时代精神，就必须科学地分析时代，分析历史，分析时代精神所反映的客观的历史内容。列宁說：“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時間、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21卷，121頁）这也是我們分析时代精神的基本方法。

自从原始公社制瓦解以来的全部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各个时代里，都存在着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無論在什么时代，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的劳动人民都是历史真正的創造者，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沒有劳动人民的劳动，社会就不能生存，时代

就不能前进，各种文化的創造就不可能。各个时代中劳动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决定着时代生活的基本内容，不断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无产阶级夺了政权，剥削阶级被推翻，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时代的主人公之后，这种阶级斗争还要在另一种形式下继续一个很长时期。因此，在谈到时代精神时，不能不首先考虑到是否反映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理想，是否典型地揭露了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的黑暗和反动，是否表现了各个时代广大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进程。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表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广大群众的要求，才打击了削弱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同时代前进的方向相一致。周谷城先生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从劳动人民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

在封建统治时代，农民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首先是那些歌颂了、反映了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革命精神和反抗要求的作品，揭露了压迫、剥削、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封建阶级的反动黑暗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这一部分。歌颂、美化压迫劳动人民或者歌颂、美化劳动人民甘受压迫的作品，是反动的、同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敌对的（更不用说今天的时代精神了）。封建道德是吃人的道德同奴才的道德结合，在封建社会建立之后，它鼓吹封建压迫的永恒性和甘受封建压迫的自觉性，这种意识尽管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是极为“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但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精神。有人用“历史局限性”为歌颂奴才道德辩护，认为在封建时代受了封建思想毒害而一心一意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而牺牲的人，可以予以赞扬。可是，历史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在过去时代的历史中，有勇敢地违反封建道德而同封建统治者直到皇帝进行斗争的人，有虽受封建道德

蒙蔽而终于起而控訴封建道德的虛伪性与反动性的人，难道他們不是历史潮流中的一員嗎？难道用他們的覺悟水平来衡量那个时代的人們的言行是“反历史主义”，而只有用甘受封建統治階級奴才道德支配的人的水平来衡量那个时代人們的言行才是“历史主义”嗎？——这里主要是想說明：在分析时代精神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問題时，基本立場是不能动摇的，压迫与被压迫、剝削与被剝削階級的階級界限是不能模糊的。当然，我們还要进一步从各个階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問題。

社会是在階級斗争中发展的，各个階級都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革命階級改造世界的斗争，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階級，无产階級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消灭剝削階級，消灭一切階級差别，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理想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共产主义新时代必然要誕生的号角。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到共产主义社会建成的整个历史时期內，无产阶级文艺中的时代精神都是同无产階級的理想、利益、革命任务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是无产階級革命时代时代精神的客观內容；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理想，是无产階級革命时代时代精神的反映形式。現代修正主义者抽去了时代精神的階級內容，抽象地談論“时代精神”“現代性”，实际上是抽去了时代精神的革命灵魂，而代之以反动沒落的资产階級的世界观，用腐朽的资产階級人性論为帝国主义瓦解人民革命运动和顛复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完全敌对的。

至于剝削階級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历史上的各个剝削階級，在它們的上升时期，当它們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經济形态向着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經济形态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它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

步的事物，在不同程度客观上符合了广大被旧的統治階級压迫並力求摆脱这种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历史发展規律的要求。可是，剝削階級的进步活动总是建立在剝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即使在其上升时期，它以全民代言人姿态出現的时候，它为了自己階級利益而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剝削，也对历史进步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它們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剝削中，就孕含着使自己从上升到沒落以至灭亡的种子。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們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事物时，它們也就轉化为腐朽沒落的旧事物，終于被革命人民所推翻。毛泽东同志对于这种历史过程曾作过如下深刻的分析：

“历史上奴隶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产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內，它們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們的对立面、奴隶階級、农民階級和无产階級，逐步壮大，並同它們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們，化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选集》第4卷，1190頁）因此，在剝削階級作为一个革命階級出現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表現时代精神的是它們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向旧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識形态进行斗争的部分（这当中包括了对劳动人民某些让步），而不是它对旧的剝削階級妥协和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的部分。資产階級上升时期，文艺作品中所鼓吹的向封建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内容，是資产階級革命时代时代精神的反映；而某些作品中歌颂野蛮的贩卖黑人的“英雄”行为，嘲笑殖民地的“土人”如何“野蛮”，則是同时代精神相敌对的反动思想。对封建階級上升时期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也要进行两方面的分析，既要反对否认他們能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片面性，也要反对把他們一切言行都看作时

代精神反映的片面性。

也不能脱离阶级内容，只从是否“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去判別时代精神。統治阶级的意識总是社会的統治意識。在統治社会的剝削阶级的經濟政治制度还没有被推翻之前，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阶级的思想总是借政治、經濟的力量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毒害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当着革命阶级刚出現时，它們的声音远不如旧的統治思想“广泛流行”。但是，正是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时代精神的表现，而暂时“广泛流行”的反动思潮，終究要被广大人民所彻底唾弃。正如列宁在《欧仁·鮑狄埃》一文中所說：“当他創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計算的。而現在知道欧仁·鮑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总之，从社会发展过程看，各个时代兴替的过程，即新的社会經濟形态代替旧的社会經濟形态的过程，也就是革命的阶级同反动的阶级进行斗争並将其推翻和消灭的过程。体现着时代发展趋向的时代精神，是反映着特定革命历史时期革命阶级、阶层的要求和理想，反映了、歌颂了新的社会經濟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社会思想，向着旧的社会經濟形态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站在革命阶级立場上，强烈地反映了一定时代新的阶级力量的成长和旧的阶级力量的灭亡，提出了和鼓吹了这一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恩格斯把但丁叫做“中世紀的最后一个詩人，同时又是近代最初一个詩人”，就因为但丁詩中反映着“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今資本主义的开始”，反映着“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而意大利正是最先的一个資本主义民族，最先在文学艺术中强烈地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民族。恩格斯又說：“現在，就像在1300年一样，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意大利会不会給我們一个但

丁把这无产阶级新的时代的誕生描繪出来呢？”（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第二冊，第109頁）以后的历史证明了：深刻表現无产阶级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作品，总是出現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則和革命理想、掀起波涛状闊的革命运动的斗争风暴中。《国际歌》所以能够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时代激动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心灵，表現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时代精神，正因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經到来，异常深刻地表达了新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心，宣告了资本主义旧世界必然死亡和共产主义新世界必然胜利，召唤着人們的这个胜利而战斗。沒落阶级的精神状态虽然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却决不能把这些作品看作时代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当作时代精神向之冲击的逆流与頑固堡垒。周谷城先生离开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而抽象地看待各种“复杂意識”，也沒有区别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同沒落时期作用的不同，把这些剝削阶级思想都看作“整体”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进程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但革命进程却不是直綫的。革命的历史进程要经历若干阶段，会发生許多曲折，阶级力量的对比的消长会有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主要矛盾也会起变化。因而在不同阶段或时期放在革命阶级面前的任务也会不同。革命实践中人們的精神状态也会随之而不同。馬克思說：“任务本身只有当它能得到借以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这一阶段出現在革命阶级面前的战斗任务，正是这一时代向前发展需要解决也能够解决的业已成熟了的矛盾，是广大人民迫切願望的反映，是开动历史火車头的发动机。时代精神鮮明而强烈地体现了这一阶段或时期的革命阶级战斗任

务的要求，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及其过程，因而必然带有鲜明而具体的时代色彩。离开火热的斗争，对当前的主要任务、群众的精神面貌没有体会，就不可能表现时代精神。例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音调，从聒耳开始，就有着鲜明的革命鼓动性，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者的思想、感情，无情地打击了敌人。可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形势任务中又各有特点。民族危亡的三十年代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强烈的号召性的音调，一浪高一浪的三个“起来”，表现了一种召唤全民奋起、刻不容缓、拼死斗争的情绪。可是四十年代解放区产生的《黄河大合唱》的音调，就表现了一种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更广阔的精神状态，痛苦的控诉、紧张的战斗，归结到人民不可战胜的伟大的力量，这是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已经壮大的新形势下，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人民精神面貌的反映。而产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少优秀歌曲，则有一种彻底、干脆、洪流一样猛烈冲击的力量，交杂着对敌人极度的轻蔑和嘲笑，它反映了美蒋统治全面崩溃的形势和摧枯拉朽般击溃敌人的战士们昂扬的精神状态。

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当它需要运用文艺动员群众力量去完成当前革命任务的时候，都是强调文艺要同当前迫切的战斗任务相结合，把这种结合看成文艺表现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别林斯基说过：“我们的时代精神是如此：无论怎样蓬勃的创作力，如果只把自己局限于‘小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及思想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这样的创作力也只能炫耀一时而已。”（《别林斯基论文学》，中译本，26页）对于别林斯基面临的那个时代，反映当前现实正是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动员群众的必要条件，他把反映当代历史同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是正确的。相似的语言在革命时代革命文

艺家的文章，还可以找到很多。它表现了归根到文艺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把上面各点集中起来，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反映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要求，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感、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历史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它深刻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代表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的阶级力量发生、发展、斗争、胜利和代表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生活方式的阶级力量腐朽、黑暗、没落、灭亡的这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从这个观点看，周谷城先生认为他在解释时代精神时把“被反映的东西，和反映的具体意义，都交代清楚了。”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既没有把被反映的阶级内容“交代清楚”，又没有把反映的革命意义“交代清楚。”这种把时代精神抽象成为超阶级的各种意识的“汇合”，是违反科学分析、违反事实的，它属于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而不属于坚持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论。

怎样才能表现时代精神？

由于对时代精神理解不同，对怎样才能表现时代精神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周谷城先生认为，时代精神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精神，任何生活在社会中的作家都能在具体作品中“反映”出这种精神，根本不包括任何主观条件。即使彼此的作品思想内

容“截然不同”也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我們认为，时代精神既然同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理想和实践相联系，同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利益相联系，那么，表现时代精神就要有一定的主观条件。拿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来说，就需要：一、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同工农兵相结合；三、深刻认识当前的社会阶级关系，充满着为实现这一阶段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的战斗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生活中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革命人民在斗争中的精神状态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新人物的发展、成长、斗争、胜利的历史过程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

周谷城先生认为，每个人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可以“截然不同”。我们认为，既然时代精神同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理想和实践相联系，便必然有共同的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就是表现今天时代精神的作品的共同思想。同共产主义理想相敌对、同当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要求相违反的作品，就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由于作家选取的题材不同，艺术表现方法不同，个人风格不同，在具体艺术作品中表现时代精神的方面、形式也会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把时代精神表现得更丰富、更深刻。但这只是方面、形式上的不同，并不是根本精神的“截然不同”。如果艺术特征和艺术独创性用于更好歌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于更动人地反映革命斗争，当然能够更出色地表现时代精神；但如果用于美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感情以至封建迷信，使之更有吸引力，在根本精神上同无产阶级理想“截然不同”，那只能起破坏时代精神的作用。

同表现时代精神联系的，还有一个艺术上的创新问题。革

命的文学艺术要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在内容上、形式上，都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在内容上，要不断地开拓表现新的革命时代的题材领域，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在形式上也要根据群众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创造。这样，革命的时代精神才能通过鲜明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这种创新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来自革命实践和实际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同民主革命的阶级斗争相结合，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创新，使得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强烈地表现了那个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从那时以来，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正因为不断反对盲目崇洋和复古主义两种保守思想，在内容上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在形式上朝民族化、群众化的方向不断革新，才使我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上以革命的新内容和新形式独树一帜，这是创社会主义之新，创民族之新，创无产阶级艺术之新。这种创新，保证了文艺能不断反映新的时代精神。

可是周谷城先生怎样看待“创新”呢？

周谷城先生认为“创新”是思维在“矛盾重重的困境中”找出“理想”的“真正可行之路”。这条“路”是这样的：

“真正可行之路为创新，即于问题突出、矛盾重重的困境中创造一个崭新而又可行的计划是也。生活陷入了困境之时，不能苟安，仍要前进；既要前进，便不能不另辟新路。另辟新路之时，不能与原有的现实完全脱离关系，也不能完全拘守原有的现实而不分离。完全脱离原有的现实，不免流于空谈；完全拘守原有现实，不免流于守旧。正当的办法在寻出问题或矛盾之所在。分析其性质；根据分析拟出一个计划或蓝图，即是可行之路，即是理想。……由理想而创作，由创作而成就艺术作品。”